

## 王 永 兴

1914年6月16日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前靠河屯，原名王中九。祖籍山东省莱州府掖县，因旱灾北走关东，举家在艰苦条件下辛勤创业，建立了新的家园——宝勤堂。他自幼参加劳动，养成了勤俭创业、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性格。

幼年在离靠河屯二十里的嘎辖镇读高小，后考入昌图中学，成绩优异。1931年9月初，升入沈阳东北大学附属中学高中班一年级（理科）。读书仅十余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沈阳。他不甘做亡国奴，流亡至北京。举目无亲，无以为生，过着讨吃要饭的乞丐生活。后在大伯父的资助下，积极补习功课，用四平街交通中学毕业的王永兴的文凭，考入清华大学文学系，至此更名为王永兴。

初入清华，勤苦攻读，文思泉涌，以黄刊的笔名，在《清华周刊》和《副刊》上发表《夜半》、《春水——一家之一》、《矮人观场》、《第四条道路》等诗文，也阅读哲学、经济学著作。但清华宁静舒适的生活，并未使他忘记故园沦陷之痛。

1935年末，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地向华北进攻，偌大的北平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王永兴毅然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在接下来的“一二一六”游行中被捕，坚贞不屈。几天后经学校师生声援出狱，又参加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选为救国会委员，成为学生运动领袖，主持了“六一三”示威游行。他代表清华学生救国会参加在燕京大学召开的北平学联第一届成立大会，被选为北平学联执行委员，负责统战工作。为拓展统一战线，他日夜奔走，广泛联系学校及社会同情学运人士，力矫运动中的极左之风，并参加编辑了《学生与国家》。因强调统一战线，反对学生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与民先队领导产生分歧。1937年初，肺结核病发，休学治疗，脱离了学生运动，并脱党。在病中他还撰写《北方青年的回响》，发表于《国闻周报》。

“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南迁，他扶病辗转来到长沙临时大学继续学业。肺结核在当时是不治之症，病友相继去世，让他常感到时日无多；加之烽火连天，国土日益沦丧，报国无门，他更觉苦闷。11月，在长沙圣经学院，他第一次听到陈寅恪先生授课，如醍醐灌顶，他找到了一生要走的路。于是从中文系转入历史系，开始师从寅恪先生。

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下，王永兴开始系统学习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他仔细研读了相关史籍，完成了学位论文《唐代后期黄头军考》。1940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研究生，在昆明东北郊的龙头村，终日苦读。后因寅恪先生滞港未归，由郑天挺、向达先生任导师。他撰写《论唐代朔方军》一文，阐扬寅恪先生“种族文化”学说，指出朔方军之所以强大，因其主力乃胡族之部落兵也。之后，又撰写了《中晚唐的牙兵》。

1943年，被西南联大聘为历史系教员，讲授隋唐史。后返回北平，1946年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助教。10月末，陈寅恪先生返回清华任教，双目失明，王永兴助其教学工作，回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他一方面协助寅恪先生备课、上课，一方面研读唐史，直到1948年12月寅恪先生离开北平。侍读在寅恪先生之侧，是他一生难得的平静幸福时光。他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自己的唐代经济研究，撰写了《中晚唐的估法和钱币问题》一文，用较多史料阐述了以虚估实估为

特征的估法问题。

1949年，他继续任教于清华大学，讲授中国通史。11月，被安排讲授联共党史，同时担任政治经济学课辅导员。1950年，被派去担负清华职工工业余学校部分教学、行政工作。1951年3月，受清华大学委派，离开历史系教学岗位，负责清华附设工农速成中学筹备工作，任副校长。他为筹建清华工农速成中学而兢兢业业、忘我工作，在杂草丛生的荒地中建立了校舍，并制定办校章程和方针，聘请教师，建立工作、会议制度等。

1954年初，王永兴被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历史教科书，负责编辑高中课本中的中国古代史部分。编写之暇，他去北京图书馆阅读敦煌文书，重新拾起已放下五六年的历史研究。他参加编辑了《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教学参考书》、《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教学参考书》，同时研读唐代法律，并逐一阅读北图所藏敦煌文书缩微胶卷，开始敦煌学研究。1957年，他发表第一篇关于敦煌学的文章——《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该文考出P. 3559、P. 2657、P. 3018、P. 2083四个历来被视为“丁籍簿”、“名籍”的文书，实为唐天宝十载敦煌县诸乡征发徭役而编制的“差科簿”，这是唐代徭役制施行的一份宝贵遗存。此文一经刊出，即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不但为中国赢得了荣誉，而且在此后几十年成为敦煌学研究的必读之作，影响了几代学人，也推进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

1958年初，因在“反右”斗争中划不清界限，王永兴被驱逐出人民教育出版社，遣送到山西劳改，以“控制使用”的身份，被安排在位于太原南郊黄陵村的山西教育学院。在饥寒苦厄之中，他仍坚持读书，继续唐代法律研究，并细读《资治通鉴》，详考黄巢军侵入岭南的路线，发表了《〈唐律〉所载“同居有罪相为隐”一语如何理解？》、《试谈黄巢军侵入岭南的路线》、《论魏徵》等文。1963年冬，被中华书局借调参加校点“二十四史”工作。他暂时埋首古籍，安心校点《魏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大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打成大“封资修”分子，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三年来，经多次抄家，图籍、衣物荡然，遭批斗、游街、毒打和严刑逼供等，几至于死。

1970年，被押送到交城县北十里岭底大队监督劳改。1972年秋，被派到交城中学，教历史、语文、数学等课。课余开始研读《敦煌资料》，用了数不尽的日夜整理了这本书所刊载的斯0613V文书（“邓延天富等户残卷”），即现在标题为“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户籍”。他复原16个断片的原本顺序，基本上恢复文书原貌，初步解决了文书内容中均田制和租调制等问题。1974年回到山西教育学院，重获自由后，他利用有限的资料，恢复了读书研究生活，连续撰写《释充夫式》、《中晚唐的赋税》等考证文章，并编写《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校注《册府元龟·邦计部》，同时继续研读敦煌吐鲁番文书。他完成了近10万字的《册府元龟邦计部校注举例》，校注内容包括先条列相关史料，之后从史实、文字、意义三个方面研究《册府》每条史料和与它直接有关的史料，实际上是对《册府》经济资料的系统整理。为了给隋唐五代史和隋唐五代经济史的研究者提供便于使用的资料，他还着手编撰《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全书拟包括七个部分：阶级和阶级关系、土地所有制、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财政。

1978年11月，王永兴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当时中国“科学的春天”带着激情和温暖扑面而来的同时，他也迎来了个人学术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

重返北大后，王永兴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教学之中。他每学年坚持讲授两门课，一是隋唐史，包括唐代经济史、唐代政治史、唐代制度史，以及隋唐史专题、专书等课程；一是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在十几年中，他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连续开设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 18 个学期，连续 21 学期开设隋唐史专题课，直到 1991 年，77 岁高龄的他仍时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隋唐史课。他还在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前身）历史系讲授隋唐五代经济史专题课数年，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本科生开唐史专题课一年，并多次为上海师院历史系和古籍所的青年教师与研究生等授课。

王永兴用“人以十之，我以百之”的精力，认真备课，一丝不苟。他用了几乎全部时间授课和培养学生。他开设隋唐史专题课，不但讲授详尽深透，旁征博引，务求其详其实，而且要求学生读《资治通鉴》、《唐六典》、《通典》等史籍并写笔记。在课堂以外，他定期到学生宿舍去检视选课学生读书情况，对每一个学生，都进行个别辅导，耳提面命，诲人不倦。他教授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的方法更为独特。他认为，设置这门课的目的是为我国培养训练独立研究敦煌学的学者，因此他把教学的重点放在培养训练学生独立研究敦煌文书的能力上，以学生实习为主，讲授为辅。他先整理研究一份篇幅较长、内容较多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写成文章，向学生讲述从录文、识字、分句、分段、解释名词，考证文书的时间性、空间性以及文书的性质，到最后写成论文的全过程，为学生示范如何从读懂文书到以文书为主参以其他史料进行研究并解决问题。之后，带领学生进入整理研究文书实习阶段。他选用百行以下或百行左右敦煌吐鲁番文书多件，发给每一学生一篇，一一指导学生录文，详细指定不同的必读书和参考书，认真批改学生整理研究文书的初稿和定稿。每个学生的作业，都要至少批改六次。他鼓励学生以创新精神，多次读书，通解全文，为文书正确定名，并将新材料与史籍文献结合，提出并解决新问题。通过这种严格的训练，王永兴言传身教，循循善诱，培养出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人才，桃李遍天下。薪尽火传，现在他的的学生大多成为高校及科研机构的骨干。

为了改变中国敦煌学落后的局面，王永兴付出了一生的努力。他不但以顽强的毅力，不屈不挠地坚持敦煌学研究，花大力气培养人才；而且奔走呼号，催生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并为学会筹措了数百万活动经费，直接促成“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的召开。在思想禁锢、学术凋敝的“文革”时代结束不久，他以开风气之先的创新精神，创办并主编了独具特色的敦煌学刊物。在出版困难的情况下，他锲而不舍，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协调解决经费、排版、印刷、装订等诸多难题，出版了五大册《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这成为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里程碑。他还为北京图书馆敦煌资料中心讲授“敦煌学”课一年，又远赴兰州、徐州等地讲授敦煌学研究方法，呕心沥血地策划“敦煌丛书”，并编辑了《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敦煌学研究。

王永兴积极筹划和参与历史学科的建设，为历史学的繁荣发展，不遗余力。1981 年，他不顾年迈体弱，多方奔走协调，创建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为北大史学发展赢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他还筹建了“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亲自购置图书、筹集资料，复制敦煌文书的胶卷，翻拍照片，积累了大量资料，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人才。

王永兴锲而不舍，钩沉索隐，潜心研究，老而弥笃。在晚年目衰手颤、书写不便的情况下，88 岁高龄的他仍苦学电脑，著述不辍。他先后出版了《隋末农

民战争史料汇编》、《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唐勾检制研究》、《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王永兴学述》、《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等10部著作和大量笔记、未刊书稿。目前，除《王永兴说隋唐》和《唐代经营西北研究》已被整理出版外，一些未刊稿仍在陆续整理出版中。

除了敦煌学和唐史研究，王永兴的学术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义宁之学。

王永兴时刻以陈寅恪先生为楷模，治学做人，一丝不苟；几十年里，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他的坚守历劫不改，始终如一。为纪念被边缘化多年的陈寅恪先生，他参加编辑《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整理寅恪先生读书札记，倡议和组织清华大学举办“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1990年），并主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

他将弘扬的“义宁之学”视为自己一生的事业，探寻陈寅恪史学体系，孜孜不倦地阐述陈寅恪治学之道。他认为，长期以来，有关陈寅恪生平专著不少，但对其史学尚乏系统论述，且对其史学渊源、史学思想等多有误解之处。他撰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论稿》，通过对寅恪先生所有论文专著的分析研究，指出陈寅恪继承发展了宋代史学，从而理清了我国古代至近现代史学的发展脉络。他还分析了陈寅恪以“求真实、供鉴诫”，“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核心的史学思想，阐明了其“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思想对中外文化交流的指导意义，研究了其继承宋代“长编考异”的治史方法，探讨了陈寅恪史学的本质特征。

王永兴为什么会选择走义宁治学的路呢？在他1956年写的“交代”中说：“我听他（陈寅恪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我为他的精博学识所惊倒。我那时候心情很苦闷，就选择了跟陈寅恪先生研究历史，治考证之学这条道路。”其实应该是寅恪先生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让他那洋溢澎湃的一腔对国家民族的激情找到了奔流的出口，化作埋首于线装书中的寂寥日子里不变的壮志和深情。寅恪先生最后所皈依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王永兴也跟随寅恪先生，以民族文化为皈依。他那飞扬的民族感情，比一二九运动时，更深沉，更理智，也更坚定了。于是求仁得仁，他满怀虔诚地读陈寅恪的书，听陈寅恪的话，行陈寅恪的道，以寅恪先生的思想和方法读书治学，成为“义宁之学”的弘扬者。

王永兴是一个具有开拓性和勇于实践、勇于创新的人，在他个人的研究和言传身教中都体现了独立精神。在学问方面，他从不囿于前人成说和为教条左右。五十年代中，他并没有陷入那个时代“五朵金花”的框框，而是从攻读敦煌卷子开始，打开了经济史研究的思路，并因此最早与国际接轨。他在命运给他的最后三十年中不畏艰难，从头做起，最终证明了自己的生命价值。他的研究虽细微而关乎大局，但他关于唐代经济史、制度史和后来关于军事史的论述其实都蕴含对大问题、大方向的追求，且都不是简单地重复陈寅恪，而是同样体现着人文关怀，是具有一定规模系统和独特风格、历经严密思考与实践的一家独创。他将敦煌文书结合制度史的研究，对于中国的唐史和敦煌学学者而言开创了一种最具实用性的研究方法，为中国学者赶上和超过世界敦煌学研究的步伐做出了卓越的努力。他的读书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式不但教育了一代学者，至今也仍被使用和证明为最成功的教学方式。

正如《王永兴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在《通向义宁之学》“后记”中所指出

的，在国家民族文化遭受重创之际，王永兴这一代学者，“当仁不让地擎起承天之柱，承担了使学术迁延不堕和衔接新旧的重任与使命。作为学术殿堂中的补天者，作为陈门弟子和义宁之学的传人，王先生不畏艰难，筚路蓝缕，将被证明是最传统而淳正的治学之道训示后学，也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学术真谛发扬光大。‘种花留与后来人’，今天的学术繁荣及走向世界的辉煌成就便是王先生和他的同辈学人创造历史的延续和见证。”

2008年9月15日，王永兴平静去世。95岁也是高龄了，但他一生坎坷，最后64岁来到北大，留给他真正做学问的时间并不多。在他去世的前一天夜里，他紧握着《陈寅恪诗集》，坐在椅子上，说：“我还想再看一会儿，不想这么早睡觉。”这样强烈的读书愿望，闻之令人百感交集。

（李锦绣）